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
当代非洲发展研究系列
总主编：刘鸿武

当代非洲安全机制

THE RESEARCH ON SECURITY REGIME OF
CONTEMPORARY AFRICA

◎莫翔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
当代非洲发展研究系列
总主编：刘鸿武

THE RESEARCH ON SECURITY REGIME
OF CONTEMPORARY AFRICA

当代非洲 | 安全机制 |

◎莫翔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非洲研究文库》编纂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 问：翟 隽 郝 平 王伟光 郑继伟 柳 斌 梅新林

主 任：徐 辉

副主任：王逸舟 王缉思 刘鸿武 杨 光 秦亚青

编纂委员会：

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卢沙野	刘希平	刘京辉	刘宝利
刘贵今	刘鸿武	庄国土	江 波	许 琳	许镜湖	朱立群
朱威烈	杨 光	杨洁勉	李安山	李 鲁	吴锋民	沈国放
张东刚	张秀琴	张 明	陈 荣	陈德喜	林吕建	金灿荣
胡 坚	赵剑英	宫 力	秦亚青	顾建新	郭 栋	倪世雄
徐 步	曹忠明	舒运国				

总主编：刘鸿武

总序 深入了解非洲,增进中非友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翟 隽

非洲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人口约 10 亿,共有 53 个独立国家和 1500 多个民族,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非洲局势发展总体平稳,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一体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不断增加,非洲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中国是非洲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非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汉朝,中非双方就互有了了解,并开始间接贸易往来。1405—1433 年,明朝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其中四次到达东非沿海,至今肯尼亚等国还流传着郑和下西洋的故事。1949 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非关系新纪元。1956 年 5 月,中国同埃及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曾大力支持非洲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在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后,中国坚定支持非洲国家维护主权和尊严,真诚无私地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赢得了非洲朋友的尊重和信任。中非友好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非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中非双方领导人共同关心和亲自推动下,中非关系在传统友好基础上呈现新的全面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00 年 10 月,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并召开首届部长级会议,这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后论坛逐步发展成为中非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2004 年和 2006 年,胡锦涛主席两次访非,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就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中国非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2006 年初,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相互学习,共谋发展”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对非政策的总体原则和目标,受到非洲国

家的普遍赞赏和欢迎。

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行,中非领导人共同确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加强中非务实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的八项政策措施,中非关系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初,胡锦涛主席专程访问非洲,全面启动了北京峰会后续行动的落实。2009年2月,胡锦涛主席再次访问非洲,进一步巩固了中非传统友谊,拓展了双方务实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峰会各项成果的全面落实。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中非经贸合作取得跨越式发展,中非贸易额从2000年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升至2008年的1068亿美元,提前两年实现1000亿美元的目标。中非在文化、科技、金融、民航、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随着中非关系的蓬勃发展,中国社会各界深入了解非洲与中非关系的兴趣和需求逐年上升,这对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此背景下,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主持编撰的大型非洲研究丛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应运而生。“非洲研究文库”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按照“学科建设和社会需求并重”、“学术追求与现实应用兼顾”的原则,遴选非洲研究领域的重点课题,分“非洲发展研究系列”、“中非关系研究系列”、“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系列”、“非洲研究博士论文系列”、“非洲高等教育国别研究系列”、“非洲专题史系列”、“非洲国别史系列”、“非洲研究译丛系列”八个系列逐步编撰出版,集学术性和知识性于一体,力求客观地反映非洲历史和现实,是一项学科覆盖面广、具有鲜明特色的非洲基础研究成果。这套文库为研究非洲问题和中非关系提供了详尽的史料和新颖的视角,有利于增进各界对非洲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文库第一本《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于2008年10月问世,社会反响良好,该书对全面客观地了解达尔富尔问题和中国对非外交具有积极意义。

“非洲研究文库”的推出离不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辛勤工作。浙江师范大学开展对非洲研究工作已有十多年历史,取得不少成果。2007年9月,该校正式成立非洲研究院。这是国内高校中首家综合性非洲研究院,设有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非洲经济、非洲教育、非洲历史文化四个研究所,以及非洲图书资料中心、非洲艺术传媒制作中心和非洲博物馆,是教育部教育援非基地,在喀麦隆建有孔子学院,为推动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促进中非文化交流和

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本人多年从事和主管对非外交工作,对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得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与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推出“非洲研究文库”系列丛书,甚为欣慰。我为越来越多的国人将通过文库进一步了解非洲和中非关系,进而为中非友好事业添砖加瓦感到振奋;我也为中国学者在非洲和中非关系研究领域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感到高兴。我相信,“非洲研究文库”的出版,将推动国内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研究更上一层楼。谨此作序,以表祝贺。

2009年12月于北京

前 言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陈德喜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 吴锋民

非洲大陆地域辽阔,文明悠久,民族众多,发展潜力巨大。中国与非洲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质的飞跃。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国内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走进非洲、认知非洲、了解非洲的广泛需要。加强对非洲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教育和中非关系的研究,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已显得日益重要。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改革开放 30 年来,浙江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日趋紧密,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一批批浙江人远赴非洲闯市场,寻商机。如今在广袤非洲大陆的城市与乡村,都可以见到浙江人辛劳创业的身影。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来到浙江经商贸易,寻求发展机会。

世纪之交,基于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学校特色学科建设的需要,浙江师范大学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凝练办学特色,积极开展与非工作,重点在汉语国际推广、人力资源开发与非洲学术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产生了广泛影响。1996 年,受国家教委派遣,我校在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了“喀麦隆汉语教学中心”,十多年来,已有 1000 多人先后在该中心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其中外交官和研究生达 500 多名,遍及非洲近 20 个国家。该中心在非洲诸多国家已声名远播,被喀麦隆政府及周边国家赞誉为“体现南南合作精神的典范”。2005 年,为表彰中国教师在传播汉语言文化、发展中喀友谊方面所作的特殊贡献,喀麦隆政府授予我校三位教师“喀麦隆金质劳动勋章”。2007 年 11 月,该中心发展为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和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2007 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喀麦隆期间,中喀两国元首共

同作出了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决定。11月9日,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副组长、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副主席陈进玉与喀麦隆高教部长法姆·恩东戈·雅克共同主持雅温得第二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孔子学院揭牌仪式,由此掀开了中喀文化教育交流新的一页。

从2002年开始,我校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在教育部国际司和商务部援外司的具体指导下,积极承担教育部和商务部的人力资源开发项目,邀请非洲各国高级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到国内研修。迄今为止,我校已举办了13期非洲高级教育官员研修班,有42个非洲国家的240余名大、中学校长和高级教育官员参加了研修。2004年,我校成为教育部四个教育援外基地之一。2006年,我校承办国家教育部“首届中非大学校长论坛”,来自14个非洲国家的30名大学校长、高级教育行政官员以及国内几十所高校的校长、学者和部分教育行政官员参加了论坛。此外,学校还于2009年5月承办了教育部第七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工作会议。

在积极开展汉语国际推广、人力资源开发的同时,学校审时度势,抢抓机遇,迅速启动非洲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2003年,我校成立了国内首个专门研究非洲教育及发展的学术机构——非洲教育研究中心,由时任校长的徐辉教授兼任主任。随后,中心承担了国家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支持的“非洲高等教育国别研究工程”项目,派遣14人分赴非洲7个国家进行实地调研。几年来,学校还承担了多项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非汉语推广研究课题,并向教育部提交了多个有关中非教育合作的政策咨询报告。

2007年9月1日,经多方论证,精心筹划,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共建,成立了国内首家综合性的非洲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由时任校长的梅新林教授兼任院长,刘鸿武教授任执行院长,顾建新教授任副院长。其间,学校同时主办了“面向21世纪的中非合作:战略与途径”国际学术会议。非洲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我校的对非工作进入了一个汉语国际推广、人力资源开发与非洲学术研究三位一体而重点向非洲学科建设迈进的崭新历史阶段。

浙江师范大学成立非洲研究院的学术宗旨是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学校学科发展。其发展目标是以“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治学精神,构建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聚集国内外非洲学者及有志于非洲研究的后起之秀,开展长期而系统的非洲研究工作,通过若干年持续不断

的努力,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非洲学人才培养基地、学术研究中心、决策咨询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以学术服务国家,为中非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非洲研究院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政策咨询等于一体,设有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非洲经济、非洲教育、非洲历史文化四个研究所以及非洲图书资料中心、非洲博物馆、非洲艺术传媒制作中心。现有专职人员 25 人。他们的成果曾获国家领导人嘉奖,有的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省政府特殊津贴奖,年轻科研人员多为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受过良好学术训练并有志于非洲研究事业。研究院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

非洲研究院成立一年多来,工作成效显著,获得浙江省政府“钱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组建起了一支以省特聘教授、著名非洲研究专家刘鸿武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非洲研究团队,先后承担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教育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部门一系列重要研究课题与调研报告项目,出版发表了包括《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等一批有学术影响力的成果。2008 年,非洲研究院被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列为与非洲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单位后,开始启动“非洲通人才培养计划”,一批青年科研人员与研究生被选派至非洲国家的大学进修学习。2009 年,非洲研究院被批准为浙江省高等学校首批省创新团队,并在外交部非洲司、教育部国际合作司支持下成立了国内首个“中非合作论坛研究中心”。在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支持下,非洲研究院被列入浙江省与中国社科院共建重点学科行列,并与该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开展了很好的合作,与非洲及欧美国家非洲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随后,以刘鸿武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团队获得 2009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它表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具备了组织跨学科跨地区研究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实力。

我校的对非工作与非洲研究,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学术组织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委、省政府、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领导相继莅临视察,指导工作;外交部非洲司、政策规划司,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非洲局,教育部社科司、国际司,商务部援外司,国家

汉办以及外交学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先后来院指导发展规划、建设思路及科研工作；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外事办公室、省社科院、省社科联等部门领导与专家也对研究院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有力地推动了我校的对非工作与非洲研究的顺利开展。

编纂“非洲研究文库”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长期开展的一项基础性学术工作，由相关部门领导与著名学者组成编纂委员会，以“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并重”、“学术追求与现实应用兼顾”为基本原则，遴选非洲研究重大领域及重点课题，以国别和专题研究的形式，集合为八大系列的大型丛书，分批分期出版，以期形成既有学科覆盖面与系统性，同时又具鲜明特色的基础性、标志性研究成果。值此“非洲研究文库”即将出版之际，谨向所有给予研究院热忱指导和鼎力支持的有关部门，应邀担任“非洲研究文库”顾问与编委的领导与专家，为“非洲研究文库”撰写《总序》的国家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先生，以及出版“非洲研究文库”的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的非洲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目前国家高度重视非洲研究和人才培养，国内已经有多所大学建立了非洲研究的学术机构。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与各相关单位开展更有效的合作，共同努力，为中国非洲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2009年12月

序一 全球视野与中国的非洲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王逸舟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刘鸿武教授组织和主编的“非洲研究文库”出版问世,这是一个让我们所有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有所期待和可能受益的宏大项目。在此,我要向鸿武和所有为此作出努力的同行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祝贺!

我自己不是非洲问题研究者,去过的非洲国家也很少,但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去的非洲研究对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的影响不够大,至少在我作为编辑看到的稿件和作为研究者接触到的有关部门及媒体,给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它多少让人遗憾。

非洲国家数目占据当今全球总数的近 1/3,这个大陆无论自然资源还是地理区位都具有其他各大洲不具备的一些优势;非洲各国总体上对华友好(用毛泽东的话说,“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现在双方互利互补的地方广泛且重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活跃与世界性作用的上升,离不开中非关系的拓展与深化。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新殖民主义论”等非议甚嚣尘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新时期的中非关系,涉及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涉及中国的非洲战略。不管从什么角度讲,一种设计全面且高瞻远瞩、形态多样且影响重大的中国非洲学都是急需的。

最近几年里,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与鸿武教授本人及他的非洲研究团队有过多次接触,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看到他们的大量新作及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看到浙江师范大学领导和各个方面对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更看到贯彻其中的一种新气象新视野,一种洞察中国外交全局之后开展非洲研究的大气,一种只有立足于全球层次和中非宏观战略关系才会具备的视野。虽然这个团队本身还有许多要加强的地方,它的朝气与追求未必代表中国的非洲研究的全貌,但“愚公移山”和“星火燎原”的故事是我们都熟悉的,刘鸿武教授及浙江师

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前景是美好的。在我看来,“非洲研究文库”便是这个神奇故事的一小段,是中国非洲学界新长征之征途的又一步。

中国外交已站在新的全球高地上,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非洲学同样朝着新的层次迈进。

2009年8月18日于北京

序二 非洲研究——中国学术的“新边疆”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刘鸿武

100 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曲折艰难的现代复兴进程,逐渐由“亚洲之中国”转变为“世界之中国”。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在越来越广大之领域与世界的前途联结在了一起。为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并对人类未来作出新的贡献,21 世纪的中国当以更开阔之胸襟去拥抱世界各国各民族之文明,努力推进人类各文明以更为均衡、多元、平等的方式对话与合作。为此,中国需要在更广泛的人类知识、思想、学术与观念领域作出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而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正是中华民族在当今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追求中国的国家话语权、表达中华民族对于未来世界发展理念与政策主张并进而为 21 世纪的人类贡献出更有价值的思想智慧与知识产品的必要努力。^①

在此过程中,“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补充,“承续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三个维度的综合融通与推陈出新,或许将为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拓展出某种既秉承传统又融通现代、既有中华个性精神又融通人类普遍知识的中华学术新品质、新境界与新气度。

一、非洲研究与中国学术“新边疆”的拓展

学术研究与时代环境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时代条件与环境因素总在某种或隐或现的形态下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过程。古人主张“知人论世”,认为要知晓其所论所思为何如此,要理解其人治学求知之特点个性,不能不考察辨析他的生活时代,不能不联系他的人生经历

^① 刘鸿武. 初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J]. 西亚非洲,2010, 1: 5.

与治学环境。^①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此,理解一个时代的学术亦如此。

过去百年中国学术之成长与变革进程,便深深地印刻着时代的痕迹。因为20世纪中华文明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任务的紧迫和艰难,更因中华学术经世致用传统之影响,中国学术过去百年的成长过程,始终紧紧围绕着、服务于中华文明复兴与发展的当下急迫之需。摆脱落后、追求先进的时代使命,使得现代中国学术的目光多紧盯那先进于我之国家民族,于是,“西洋学术”、“欧美文化”,乃至“东洋维新”、“俄苏革命”,都曾以不同之方式,进入中国学术核心地带,成为过去百年中国学人热情关注、努力移植、潜心研究之重心与焦点,各种形式的“言必称希腊”成为中国学术一时之现象,也便自有其合理之时代要求与存在缘由。而在此背景下,对于遥远他乡那些看似与国家当下之复兴大业、复兴命题关涉不大或联系不紧的学问领域,对于那些与中国一样落后于世甚至尤有过之的不发达国家、弱小民族的研究或学问,人们便一直关注不多,问津甚少。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非洲大陆这个重要的自然地理区域和人类文明世界,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世界中一块“遥远边疆”,一片“清冷边地”。偶尔,会有探险者、好奇者、过路者进入其间,于其风光景致窥得一角,但终因天遥地远,梁河相隔而舟渡难寻,直至今日,非洲研究这一领域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总体上还是一个具有“化外之地”色彩的知识领域,一块要靠人们发挥想象力去揣想的遥远他乡。

而在西方学术界,非洲研究却已经有百多年的经营历史了,如果加上早期殖民时代探险者、传教士留下的那些并不甚专业的探险游记、传教回忆录,西方对非洲大陆的认知与研究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三四百年前。在这个过程中,非洲研究在塑造西方现代学术形态、培植西方现代学术气质方面,均扮演过某种特殊的角色。西方现代学术的诸多领域,诸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生态学等,各种流行一时的理论或流派,诸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传播理论、发展研究、现代化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论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或形态,与非洲这块大陆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直到今日,在非洲大陆各地,依然时常可以见到西方学者潜心考察、调研与研究的踪迹。

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随着近年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中国学术界开始尝试采用更加独立、更加全

^①《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面也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的整体结构,及中华民族与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国家之如何建立更为平衡多元的交往合作关系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过去30年中非合作关系之丰富实践及这一关系所彰显的时代变革意义,使得非洲在中国学人眼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发生了重大转变,非洲研究不仅得到重视和加强,而且研究的兴趣和重点也超出了以往那种浅层与务实、只着眼于为政治与外交服务的局限,而开始向着探究人类文明之多元结构与多维走向、向着探究一切社会科学深切关心的本质性命题的方向拓展延伸。渐渐地,人们发现,非洲研究成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一片“新边疆”,一块辽阔广大、有无数矿藏和处女地等待新来者开拓的沃土。

我们说,中华民族历来有关注天下、往来四海之开放传统,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地情怀。在其漫长的文明演进史上,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突破地域之限制而与外部世界建立接触和交往,由此扩展着自己的视野,丰富着自身的形态,并从中获得更新发展之动力。这种努力自进入近代以后,尤为强烈与明显。虽然因时代条件之制约,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国学术主要关注于欧、美、日发达国家,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复兴并因此而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过程中,也开始与遥远非洲大陆建立日益紧密的文化对话和交流合作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非洲研究日益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这一现象的到来,应该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昭示时代变革的象征意义的,它折射出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在回归和继承优良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日益面向全球与未来,日益拥有了新的自由与自主、自信与自觉的精神气度。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将来的某一天,在那遥远闭塞的非洲内陆的某个村庄,在那湿热茂密的非洲雨林深处的某个偏僻小镇里,我们也能意外地发现中国学者的身影。他会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在这远离中国的非洲边远村庄里做了多年的潜心研究,而并不太多地考虑他的研究与学问是否有他人认可的某种“价值”或“意义”,只是做着纯粹基于个人学术旨趣、知识好奇心的田野考察、异域文化研究。那时,我们或许就可以说,中国学术的自主意识与现代品格获得了更大的成长,有了“值得世界给予更大尊重与敬意的品质了”^①。

^① 刘鸿武. 中国外交研究的新高地——评王逸舟教授新著《中国外交的新高地》[J]. 外交评论, 2009, 2:148.

从一个更长远的当代中国发展进程来看,在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融为一体而中国也在努力追求自己的大国强国地位的进程中,非洲研究这一“学术新边疆”之探测与开垦,对中国学术现代品质之锻造——诸如全球视野之拓展、普世情怀之建构、主体意识之觉醒、中国特色之形成等,都可能具有某种重要的引领与增益作用。

二、当代中非交往之学术史意义

非洲文明是整个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数千年间,非洲有过非常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经历,文明形态也达到很高的水平。非洲人的天才创造在过去 100 多年来已经逐渐被世界所了解,尽管现在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总体上说,相对于西方对非洲文化、历史、艺术的认知,中国是一个晚到者。现代意义上的非洲学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尽管历史上的中国与非洲也有过有限的联系交往,但现代中国对非洲的认识却是最近 50 年才开始的,目前也还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事实上,早在 100 多年前,西方就已经在拼命地吮吸非洲文明的乳汁,在享受非洲人民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珍品了。过去 100 多年,非洲文化艺术曾给西方现代艺术带来特殊的活力,从不同方面刺激西方艺术家们的想象力,由此拓展了西方艺术新的发展空间与风格再造,加速了西方现代艺术形态与范式的变革进程。

就非洲文化艺术自 19 世纪以来对西方影响之广度与深度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西方现代艺术在某些方面曾出现过“非洲化”现象,以至于在今日的西方艺术与文化世界中,处处渗透着来自非洲大陆的元素:非洲的音乐、非洲的舞蹈、非洲的节奏、非洲的风格。当然,那是一个经过了西方精心改造、重新编码、巧加利用的复杂过程。^①在这个过程中,非洲文化、非洲艺术的最初源头是被隐去了,但如果我们作一番深入的研究辨析,就会发现,在西方现代文化与艺术的世界里,有许多被称为现代艺术伟大创造的风格样式,有许多被认为开启了西方现代文化新领域的精神丰碑,包括毕加索、马蒂斯、高更等最有影响的西方现代艺术家的许多作品之风格、形式和灵魂,都曾有过对非洲文化

^① William Rubin Edit. “Primitivism” in 20th Century Art: Affinity of Tribal and the Modern[M].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Vol. 1, 1984: 241.

与艺术的某种巧妙移植、借用、吸收。^①这种移植、借用与吸收,自然是拓展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领域,也给现代人类带来了特殊的艺术感受,它表明西方现代艺术家勇于开新、善于利用其他民族文化与思想智慧的传统,本身并无不可,值得今日之中国学者艺术家们学习、借鉴和反思。问题却在于,当现代西方已经在充分享受非洲人民的艺术创造与财富,当现代西方艺术因为从非洲艺术中获取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天才想象与灵感而获得变革与发展的动力与智慧时,却又按照西方的艺术观念,以西方之艺术为尺度,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偏见,轻易断定非洲原始落后,妄称非洲没有历史与文化,便很不妥当了。

事实上,在过去 100 多年西方汲取非洲文明与艺术财富的过程中,西方也垄断了对非洲文明与艺术的解释话语权。西方实际上是按其需要,按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艺术观来解读和评价非洲的文明与艺术世界的。于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非洲文明与艺术,通常被贴上了一些武断而简单的标签,诸如“原始的”、“史前的”、“野蛮的”,等等。百多年来,世界所认知的非洲文明与艺术,或者说,世界对非洲文明与艺术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角度,其实是被西方设定好的,被西方人建构出来的,那其实是一个“西方的非洲”、“西方的非洲艺术”。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包括整个东方世界,甚至非洲人自己)也往往是通过西方的眼光,按照西方人设定的标准或尺度,来理解、认知和评价非洲文明与艺术的。这百多年来西方主导下的“非洲文明认知史”进程,其所建构的“非洲文明观”或“非洲艺术观”,其成就与不足、所得与所失,自然需要有认真的反思与总结。事实上,非洲艺术并不能用“原始”二字来形容,它只是更多地保持了人类对于艺术的最纯真的理解,更多地保持了人类因艺术而得以呈现的那种本真的天性,就此来说,欣赏非洲之艺术与文明,或许有助于我们回到人性的本原,回到人类最真实的心灵深处。我们当以一种敬意与温情,以一种平等的心态,重新来认知非洲人民的天才创造、巨大活力及对现代人类的特殊意义。

中华文化地处东亚大陆,在其漫长演进史上,它一直努力突破地域之限制而与外部世界进行接触和交往。在 20 世纪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复兴并因此而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过程中,与遥远非洲大陆的文化交流合作,对于

^① William Rubin Edit. "Primitivism" in 20th Century Art: Affinity of Tribal and the Modern[M].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Vol. 1, 1984: 125-179.